

在废墟上俯视震碎的面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命的救援已不再可能,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将与废墟一起,成为一种记忆。人们对灾情和救灾的关注热情已在减退,商场恢复了往日的热闹,酒吧和KTV包厢重现灯红酒绿,双休日的新街口又开始堵车。我们当然不希望大地震长期影响社会的正常生活,更不希望灾难的创伤经久难弥。我们也欣慰地看到,地震唤起的爱心还在延续,善良的人们在灾后重建中仍然挺着他们的肩膀。

可是,随着赴灾区的记者和志愿者们陆续返回,随着媒体报道的进一步深入和客观,我们也看到了灾难中人性的另一面。我们在了解了那么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之后,还听说了有些人利用灾难谋利作秀;也听说了某些官员,就因为他的座驾被不小心泼进了消毒水,而对志愿者拳脚相加。当然,同那些数不胜数的崇高的无私的善行相比,这些丑行是个别的微不足道的。

我们鄙视并痛斥这类丑行。

我们深知,在自然力量的重创之下,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我们不能自命不凡,以精神救世主的姿态来说三道四,也不可以轻言反思,这是沉重的话题。但



是,作为传媒,我们又不能不说。

南方周末说得好,大地震震掉我们心灵上的尘埃,也震碎了我们日常的面具。既然在这场灾难中,人性的伟大与渺小共存,真善美与假丑恶并行,并被充分彰显暴露,而且,随着阵痛的过去,一些面具会被重新拾起,一些新的假面会招摇过市。所以,我们有理由在讴歌的同时摧毁,摧毁那些面具下的丑陋嘴脸,将它们与废墟一道深埋。

我们有责任与社会一起,借助这场灾难给我们带来的契机,像对待自然灾害那样,勇敢地面对我们心灵的创伤,大声地宣示香花和毒草,让鲜花开得更加绚烂,让毒草失掉生存

的环境;让经过洗礼的精神得到升华,让人性的丑陋无地自容。否则,我们就不能奢谈什么重建精神家园。因为,假如善行常遭耻笑,真诚总是伤痕累累;假如毒草的蔓延让香花窒息,我们有没有精神家园,我们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家园,就还是个问题。

重建家园容易,建设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则要困难得多,要经过几代甚至数十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我们不因此放弃,因为大地震已经让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本性——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是那样的友爱无私真诚顽强。

愿大地的痉挛,将娩出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

——编者

摘自《南方周末》的报道

冲锋艇一次最多只能载十人,在这庞大的逃难队伍面前,十几艘忙碌的冲锋艇显得力不从心。一艘给阿坝铝厂送救援物资的冲锋艇在岸边打转,不敢靠岸。负责送物资的军官担心:“老乡们的情绪激动。”冲锋艇还未停稳,几个村民就已经从水里上了艇,军人们只能在村民们的拥挤中往岸上搬物资。物品还没全部搬上岸,艇上已经坐满了村民。一箱药品在拥挤中掉进了水里,迅速被捞上来,纸箱已经烂了,药品沾满了泥浆。接物资的军

人喘着气大叫:“这可是救命药啊。”

两个男孩被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的同一个空隙里,一个消极地等待着,另一个则不断鼓动人们先救他。“先救我吧,叔叔,我是班上的第一名,”他说,“我以后一定考军校。”当他弄清楚站在外面的是武警之后,他改口说:“我以后考警校。”

15日下午,一个当地居民模样的男子拿着两个包出城,在山口处被特警队员截下。特警问:“一个学生书包,一个女包,哪个是你的?”男子说都是自己的。特警在女包中找出一个存折,

问他账户名字是谁,他回答错误,立刻被拘捕。

16日,在废墟上,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个人走进了一家通讯器材店,出来时拿着一只手机。他边走边拆掉包装,从各个角度查看它。一个男人对我们解释说:“现在拿点东西不叫抢劫,叫自救。”

游客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警惕灾难腔与灾难脸



被营救出来的陈坚,在废墟中埋了三天三夜,人们欢呼着。记者启发与调动着陈坚说了许多话,还接了热线电话,以满足新闻记录的需要,塑造灾区人民的不屈形象。我一年的泪水都在这几天奔腾了,感动模糊了我的脸。然而,陈坚充分满足了受众的想象和情感需求,却永远闭上了眼睛。且不说这样的死亡是否与这次采访有直接的关系,起码这种灾难腔式的新闻提问,对刚刚受难脱险的生命是一种消耗。我这才惊觉,我的灾难都浪

费在灾难上了。

这次四川大地震,新闻报道空前透明,中国新闻机制正在焕发着新的生机。但是某些新闻和网络媒体,就像一个暴发户在尽情挥霍着飞来横财,穷尽时段与版面透支着视觉震撼与情感,非常杨丽娟地泛滥着灾难崇拜。

灾难来临时,除了客观报道新闻事实外,还有使命从理性情感和人文关怀来诉求灾难觉醒,而不是任其宣泄。新浪就做了《十大感动场面》和《十大救人英雄》等专题,而有些媒体请死里逃生的孩子,一遍遍残酷地回忆悲惨往事,一次次无情地揭开当事人那些血淋淋的伤疤。凤凰卫视女主播陈晓楠就感慨,没勇气提最残忍的问题,甚至连某些网友,也以灾难腔对一些名人明星捐款数额进行盲目攀比。《南方都市报》在哀悼日当天说:就是这三分钟,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哭泣。这句话的技术诉求,不是简单的哭泣与煽情,蕴含其中的真情,同样流露着巨大的人

文关怀。

灾难腔还导致了一些灾难脸。我认识的一个女孩,每天沉浸在灾难里泪流满面,弄得茶饭不思,无心工作,忧郁得比失恋还要忧郁。人民为灾难感动是有爱心的表示,但是沉浸在这种悲痛中不能自拔,就是媒体不负责任尽情渲染的导向结局。还有一种灾难脸与灾难腔结伴同行,潜伏着更加危险的信号。《现代快报》报道了南京一个乞丐向灾区捐款的新闻,这种独特的新闻视觉折射出特别的社会现象。但是网络上的正反两方作者,居然摆出一副灾难脸,祭出一副灾难腔,挂义正脸谱,行粗暴文风,开怀对骂,实在令人心寒。

有些媒体在浪费着这些难得的自由福利,用粗糙还原和情节渲染把自己的新闻责任蒙混过去,人为制造灾难煽情与泪水疲劳。特别是画面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符号,除了给人心灵上的震撼外,还应该承载着灵魂上的指引。本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挖掘和截取着客观积

摘自作家富豪榜制榜人的博客

地震发生那天,住在13楼的贾平凹晃得一塌糊涂,家里的东西也乱七八糟,“还以为是西安发生了地震。”当天夜里他没睡觉,看新闻看得流泪,“太悲惨了。”贾平凹向《怀尧访谈录》独家透露:“明天我将公开拍卖自己的书画,所得款项全部捐给灾区。”

中国举证文学第一人岳南:“愿每一位作家都力所能及地行动起来,与遭遇不幸的同胞共渡难关。我这个没人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人也要捐。”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我一直在关注电视直播,真是惨不忍睹的场面,有一种切身感受。这是一次少见的、残酷的、大型的自然灾难,既不能怨天也不能尤人,我们只能承受这种损失和伤痛。我已经参加了作协机关的捐款,接下来我还会做很多工作支援灾区。”

陕西著名作家孙见喜:特地书写了书法作品,参加赈灾义卖。

作为第156棒火炬手的著名作家刘震云表示:“这次的灾难太大了,来得太突然了。我想借奥运火炬,祈福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的同胞,希望他们早日从创痛中走出来,重建家园。现在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一份能力,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希望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让更多的受灾群众早日脱离危险,恢复正常的生活。”他在第一时间已为灾区人民捐款。

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阎安寄语灾区:“请求星空下垂,照耀这些黑暗中的身影。”

这里的作家静悄悄



在与灾难作战的日子里,作家们正在忙什么呢?

地震爆发后,关于作家的第一个消息是韩寒、罗永浩奔赴灾区,韩寒后来放弃了深入震中的念头,因为不想让别人救自己,而是改为筹集帐篷、衣物等物资,还在上海建立了一个赈灾物资中转站,将筹到的物资运往灾区。

然后是关于作家李西闽的消息,他在彭州一个旅馆里写作,结果被压在废墟下,生死未卜,王海鸰、朱大可、王小山等作家展开营救活动,发动网友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并提供帮助线索,李西闽最终被解放军成功救出。作家富豪榜的制榜人吴怀尧给我打电话,他要给作家们一打电话,询问他们将如何赈灾,给他们一些赈灾的压力。他打听的是,刘和平捐出了17万的稿酬,陈忠实表示了极大担忧,贾平凹心情很沉重,要拍卖自己的字画给灾区筹款。郭敬明捐了钱。

中国作协也有动作,5月13日,中国作协发出号召,作家到灾区去,“用笔记录抗震救灾过程中党中央领导亿万人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英勇壮举,用文学的形式生动反映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和伟大精神,鼓舞士气,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胜利。”似曾熟悉的语言,一如既往地豪迈。但是,英勇壮举你怎么记录?感人事迹莫非要写成快报?夺取胜利与作家有何关系?

中国的作家们,还在遵循着老套的运作方式,还使用着慰问团与宣传队的模式,电视媒体

身边的鼓声



大地震一来,所有话题都脱不了赈灾和救援,即便是以文字为生的人也无例外。而这种时候,一上来肯定是无心著述的。就像我在我的巨型短诗集《花火集》记下的:“大灾震飞了诗。”但总要做些什么吧。捐钱,在电视和电脑前往返看新闻,和大家一起祈福与叹息……曾对一个朋友讲,可能也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幻想自己钟爱的“写作”这个职业里,还能有事务性的功能,就像那些能冲进废墟下挖人的消防员,和在余震中救助伤员的医务人员一样。

文字的价值和它的物质能量在这世上是不对等的,有的时候还可能成反比,这不能不说是此时一个遗憾——大灾面前,文人济世无力的遗憾。但是先不要灰心,我们还能在精神上做一点事情。毕竟面对巨灾,精神的力量是支撑人们坚强起来,走过危局的重要因素。所以写作的人,无论如何悲痛,还是要回到他的旧岗位,去应对地震给人们带来的、新的精神危局。

文人中似乎有一种未战先降的说法:“大灾面前,写诗是可耻的”。不敢苟同。因为在任何的时代,凡遇有危及人类生

将灾区信号即时传往世界各地,报纸每天出着几十个版,不断更新的博客成为新闻的原产地,真实的新闻比文学更传奇更扣人心弦,已经“失业”的中国作协的作家们还能记录什么呢?作家们需要有危机感,若想不被淘汰,就要想清楚,除了唱赞歌,你们还能做些什么?

有一些例子可供参考,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海明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赶到前线,写下大量报道,写了《丧钟为谁而鸣》,并拍了纪录片;中国河南艾滋病肆虐时,作家阎连科长期在艾滋病村做义工,并写下《丁庄梦》,描写了苦难,刻画了伤痛;作家杨显惠数年来采访大饥荒当事人,写出《夹边沟纪事》等传世之作。

这些人,他们没在谁领导下,没专门赞美英勇壮举,记录的也不是感人事迹,但他们是真作家。他们与作家慰问团的差异不言而喻。

后来,铁凝、刘恒等人参加了央视的赈灾晚会。但这样的行动只是拾人牙慧,作家们需要有自己的行动,发出自己的响亮声音。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公民,你能不能不等作协号令,就单身赴难,像个硬汉一样去救险?如果你是女作家,你能不能卷起袖子,到灾区医院去做义工?你能不能像个母亲那样,去安慰哭泣的孩子?如果你不去灾区,你能不能上街,利用你的影响力去义卖、去募捐?如果你不能上街,你能不能多写些文章,来表达悲伤,来呼吁行动?

大难来临的时候,民营老板开着挖掘机奔赴现场,公司白领打着“飞的”赶赴灾区,报社记者先斩后奏赶去采访,年轻妈妈要组织心理救援队去安抚儿童。他们并没有人统一指挥,而是听从了心的召唤。希望作家们不要太听话,不要太迟钝,不要太安静。

潘采夫:现居北京。生于农村,长在小城,学在省城,现在京城摆摊卖报。毕业八年,正从事第八个工作。

存的事件发生、凡遭遇撞击心灵的时刻,必须要有一两支笔去加入洪流,去支撑住精神和心理,同时记录下人的不可战胜,以及对自身文明的反省。这是每个有责任感的作者,跟自己职业间所签下的无字之约,而今正值践约之时。

汶川大地震是我们身边的“9·11”,这一刻,再迟钝的国民都会是一个小小的诗人和思考者。所以我不会认为像大家关注名流捐款这类事,仅仅属于单纯的“强人所难”或“哄抬思维”这种老套精神定式。爱心当然是不能以数字来估衡的。可事实上,当我看到一个韩国艺人对灾区的捐助,超过了内地许多大片导演、明星夫妇、“德艺双馨”“最受观众欢迎”的影帝影后们那个不无默契与暧昧的“10万”,我感到了作为国民的羞愧。而当我注意到一个靠笔为生的画家捐款数额超过了许多传媒集团,和以投资质次价高的“大片”闻名的影视公司时,我对艺术家这个行业的认识,又产生了新的理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当画家在央视引述这段话时,我甚至为诗歌虚荣了一小下。不过,转瞬即逝。因为恰在同时,我仿佛听到了鼓声——那是电脑在召唤我工作的声音。我在网上给一个朋友这样回复:对于不在灾区的人,除了奉献爱心,他的任务还包括坚守好工作的常态,即便是大灾,也休想吓倒和干扰我们。

徐江:作家。著有随笔集《爱钱的请举手》,批评集《十作家批判书》《十诗人批判书》等。